

六朝地志辑佚得失与辑本榷诂*

黄毓芸

提 要：六朝地志是重要的地方文献，然断简残编难以尽传，非辑佚、考证不得其真，不得其用，而辑佚得失的总结与前人辑本的考察则是关键的一环。诸家辑本各有优长，后出转精，在地志概貌的恢复、辑佚来源的探索、辑佚范式的确立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辑佚成果整合、佚文考辨、海外资源利用方面尚显薄弱。此外，六朝地志辑佚经典成果《汉唐地理书钞》与《汉唐方志辑佚》中，尚有可榷佚文数则。

关键词：六朝 地志 辑佚 得失 商榷

地志又称地记，是专记一地山川、风土、物产、人物等情况的著作，也是中国方志早期的编纂形式之一。六朝时期，地志逐渐兴盛，不仅数量大增，内容也更详备，这些文献能为六朝历史、自然、社会各方面研究提供翔实材料。然而典籍流传经“五厄”“十厄”，且“凡累代典制，积久必多散佚”^①，地志自不例外。况雕版印刷普及前，汉唐典籍包括地志在内多凭手写传钞，荒坟断碑，更难以尽传，辑佚则是恢复地志原貌的重要手段。梁启超云：“书籍递嬗散亡，好学之士，每读前代著录，按索不获，深致慨惜，于是乎有辑佚之业。”^②六朝地志年代久远，文本鲁鱼亥豕，断简残编，目录帝虎，辑本乾坤不在少数，非辑佚、考证不得其真，不得其用。

近年来，六朝地志辑佚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张帆帆《六朝地记研究述评》对元明至今的辑佚情况做了概述^③；邵岩《清代学者辑佚六朝地记考》对清人辑佚六朝地志的成就与不足做了总结。^④但六朝地志的辑佚除需全面爬梳前人成果外，还应建立在辑佚得失总结与辑本考证的基础上，方能避免过度依赖经典成果，从而寻找新的突破口。

一 六朝地志辑佚方法

宋郑樵《通志·校讎略》提出“求书八法”：“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评价：“这段言论，在八百年前的南宋初年学术界，诚然是一种创见！无异替当时学者指出了一条辑佚的路。”^⑤这种方法是针对搜求整本书而言。又明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约》的《藏书训略》也有关于辑佚之法的论述：“书有著于三代亡于汉者，然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书有著于汉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之；书有著于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每至检阅，凡正文之所引用，注解之所证据，有涉前代之书而今失其传者，即

*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方志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项目编号：15ZDB107）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江藩：《经解入门》，天津市古籍书店，1932年，第27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93页。

③ 参见张帆帆：《六朝地记研究述评》，《辽东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④ 参见邵岩：《清代学者辑佚六朝地记考》，《史志学刊》2019年第6期。

⑤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299页。

另从其书，各为录出。”赵振铎《古代文献知识》总结这种辑佚方法：“是将群书中引用这部佚书材料一一摘录出来汇集到一起。”^①这种方法则是从其他典籍中搜集佚文、佚句，掇拾补录。

“辑佚书”和“辑佚文”是最重要的两种辑佚方法。六朝地志流传至今“十已亡其六七”，“百不存一二”，后世学者辑佚只能采用“另从其书，各为录出”，以辑佚文为主的方式，从文献征引中搜求地志文本。

关于辑佚文的资粮，近人刘咸炘总结：“辑佚者所取资最多者，曰三注、四大类书。三注者，《三国志注》《水经注》《文选注》也。四大类书者，《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也。”^②今人张舜徽归纳辑佚来源有五：“一、取之唐宋类书，以辑群书；二、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三、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取之诸史及总集以辑历代遗文；取之《一切经音义》以辑小学训诂书。”^③杜泽逊提出辑佚来源有四：“（1）古注；（2）类书；（3）小学书；（4）其他汉魏六朝隋唐古书。”^④均是从普遍情况出发，而辑佚六朝地志各家又“因类以求，取之者广”，辑佚来源则更多。

较之一般图书，六朝地志辑佚有其自身特点，除利用“唐宋类书”“子史及汉人笺注”“诸史及总集”等典籍外主要还利用地理之书。包括（1）地理杂记，如唐段公路《北户录》、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等；（2）地理书。总志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宋祝穆《方輿胜览》等；专志如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水志如北魏酈道元《水经注》等。（3）后世方志，如宋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等，可谓以方志辑方志。

从辑佚方法差异看，囿于时代发展，明清学者与现代学者在新材料的使用、新工具的利用上有明显差距。尤其随着古籍电子化，现代学者不仅可利用电子光盘文献，还能利用网络数据库文献直接检索佚文，辑佚方式较前代更便捷、高效，但电子文本疏于校对，因此需多方求证，慎之又慎。

二 六朝地志辑佚体例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曾提出评判辑佚优劣的标准：

（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则劣。（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例如《尚书大传》，陈辑优于卢、孔辑。（三）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例如秦辑《世本》劣于茆、张辑。（四）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例如邵二云辑《五代史》，功等新编，故最优。^⑤

① 赵振铎：《古代文献知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0页。

②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第1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③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第302页。

④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第223页。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02页。

可以看出梁氏认为好的辑佚要求注出处、多而全、辨真伪、排次序。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在此基础上又增补 6 条：

（一）辑佚能详考佚书、作者而撰写叙言者优，否则次之。叙言学术水平高者优，否则次之。（二）若对互见佚文加以缀合者，其缀合的方法科学者优，否则次之。（三）所辑佚文能详为校勘者优，否则次之。（四）于所辑佚文中的史实、典故、文字能详为考辨、注释者优，否则次之。（五）辑佚综结工作做得完善者优，否则次之。（六）规模较大的辑佚成果有索引者优，否则次之。^①

曹氏增补 6 条概括起来即撰叙言、标异文、详校勘、勤考证、善总结、编索引。以上 10 条评判辑本质量的标准实际也包含了对辑佚体例的要求，其中注出处、排次序、撰叙言、标异文、详校勘、勤考证几项可作为衡量辑本体例优劣的主要标准。这里选择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地志辑佚著作即陶宗仪《说郛》、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5 部进行比较。

表 1 六朝地志辑本体例比较表

标准 辑本	撰叙言	排次序	注出处	标异文	详校勘	勤考证
《说郛》						
《汉唐地理书钞》	√		√			
《〈永乐大典〉方志辑本》	√	√	√			
《会稽郡故书杂集》	√	√	√	√		
《汉唐方志辑佚》	√		√	√	√	

说明：“标准”指从梁启超、曹书杰提出的辑佚书优劣标准中总结的体例标准，“辑本”指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种最具代表性的地志辑本。凡辑本具有某体例特征，即在相应位置划“√”

不难看出各家辑佚体例有较大差异，明陶宗仪《说郛》虽誉为“方志辑佚之嚆矢”^②，但在辑佚体例上不及后世辑本考究，该书所辑每部地志卷首仅标明年代、撰人，未对相关信息进行考证；后罗列地志佚文，既未标明来源，又无文本校勘、考证，是诸辑本中在体例方面优势最不明显的一种。其余各家辑本各有短长：

1. 撰叙言。除《说郛》外，其余各家辑本均撰叙言说明地志年代、撰人、流传等问题，其中以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为最优，王氏辑本所撰叙言除对地志相关信息进行考证说明外，还对前人研究进行简要考辨，如《汉唐地理书钞·梁鲍至〈南雍州记〉》辑本序：

① 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93 页。

②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1 页。

按本记称简文“镇襄阳日”，引刘孝威、庾肩吾等于高斋，综覆诗集，鲍至亦在其列，则此记当即至所自撰。《唐志》作鲍坚，盖二字相似致误，若《御览书目》作郭仲产，则仲产在宋已坐义宣事诛，安得至梁，《说郛》题作晋王韶，盖非也。今从本纪，断作鲍至。^①

六朝间《南雍州记》有梁鲍至、刘宋郭仲产等多种，王氏此叙言通过佚文所载“镇襄阳日”考证此条佚文属鲍至《南雍州记》，又指出《说郛》之误。但王谟辑本体例在其他方面又略显不足，曹书杰指出：“其一是辑文所注出处不够详明，对大部头的书也不注明确切的卷帙，使用者要查核原书十分困难。其二是校勘不甚精细，特别是对所辑佚文见于二种以上书籍征引的互见佚文的比勘尤显不足。其三是辑佚所据多非善本，沿袭旧误较多。”^②但不能否认，王谟能以一己之力将数量众多散佚地志搜辑起来，已是功不可没。

2. 排次序。宋郑樵《通志·校讎略》：“书之易亡亦由校讎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地志佚文散见各书，不相联续，若辑佚者不排次序，所辑佚文终究无法缀合成书。陶宗仪《说郛》、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均未对佚文进行编排，仅简单罗列，无分先后；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虽按材料出处的时代顺序排列，但于地志体例无涉。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均依六朝州郡建置对佚文进行了编排。笔者认为，佚文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可简单依地域排列，若数量众多，还应考虑排列的逻辑层次，如地域下再分门类，或门类下再分地域，或大区域下再分小区域。

3. 注出处。除《说郛》外，其余各家辑本均标明佚文来源，但详略程度不同。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仅标注书名，无卷帙；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不仅标注书名，且详至卷数。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虽以图经为辑录对象，但也为地志辑佚体例提供了良好范式，其所标出处不仅有书名、卷数，还精确标明所在卷数的版叶，如：“《雍州图经》曰：潼水在华阴县界。——《六臣注文选》，卷10，15b 潘安仁，《西征赋》‘黄巷以济潼’句李善注引。”^③可谓辑本来源标注的优质范式。

4. 标异文。同一条材料在不同文献中有不同的文字或语句，各书引文互有详略，均应同时注明。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用不同方式出注异文。鲁迅辑本采用随文出注的方式，如辑晋贺循《会稽记》：

石簍（《寰宇记》引作‘匱’，下同），其形似簍，在宛委山上。《吴越春秋》云：在于（二字《记》有）九山东南，曰天柱山，号曰宛委。其岩之巅，（《记》有此句）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御览》作盘石，今从《记》）。^④

这样的体例既可使佚句完整，又能反映同一材料在不同文献中的呈现状况。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则采用文末出注的形式对部分佚文互见情况进行说明，这样的方式虽也反映了异文

①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第346页。

② 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③ 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7年第27期。

④ 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93页。

情况,但相较随文出注的缀合方式,在完整性、科学性方面则略次之。

5. 详校勘。地志辑佚本辑自他书,文字已多次誊转,难免讹夺,非经校勘,不能卒读。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对部分佚文进行了校勘,如辑佚名《信都记》:

衡水,亦曰长芦水,即浊漳之下流也。水又袁潭¹渡,历下博城北,而逶迤东北注,谓之九争曲,水味咸苦,俗称苦河,亦谓之黄漳河是也。(《御览》卷六四衡水、《寰宇记》卷六三信都县)

1. 潭:误,《水经浊漳水注》云:“衡水又北为袁潭渡,盖潭自邳往还所由,故济得厥名。”当以“潭”为是。^①

这是采用他校法进行的校勘,此外上述辑本还有以本校法、理校法进行校勘之例,不赘。

6. 勤考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肯定清代辑佚成果的同时也指出:“清儒所作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钞匠之能事耳。”认为辑佚若不对佚文中的史实、典故、文字进行考辨、注释,则与“钞书匠”无异。上述所举代表性地志辑本均未对佚文内容进行考证,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虽不乏考证之笔,但均是叙言中对方志本身的考证,或囿于个人精力或因辑佚体量之大,未能对方志内容进行细致考辨。

综上所述,除《说郛》外,六朝地志辑本的代表性成果在体例上各有所长,后出转精,为以后地志辑佚提供了极大参照;但各家辑本在佚文考证方面仍显不足。

三 六朝地志辑本榷诂

(一) 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代表了清代古方志辑佚最高成就,关于该书缺陷,华林甫说道:“王谟辑佚时,据其自称:‘兹所借钞(《太平御览》)亦系旧本活字板,错简脱叶、阙文讹字不可胜数,苦无善本校对,不甘以意补缀,沿谬承讹在所不免,甚有因而割弃不录者。’事实上,《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中标明为《旧图经》《图经》《旧经》《州图经》而被王谟误辑入《隋州郡图经》者不在少数,而《太平寰宇记》中标明《隋图经》却为王谟所漏辑的也有17条之多。王谟辑《隋州郡图经》佚文中,还有唐武德、显庆三年甚至肃宗上元元年之事,显然辑错了。”^②他指出王谟辑本存在漏辑、误辑等问题。王勇也指出:“因作者在辑佚时条件所限,致使书中存在条目漏辑、文字讹误等问题。”^③又校正书中讹文29则。此外,笔者发现王谟辑本尚有一处值得商榷:

丹阳冶城,去官三里,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又云孙权筑冶城为鼓铸之所。既立石头大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当是徙县治,空城而置冶尔。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汉高六年,令天下县邑,秣陵不应独无。(《世说》注)^④

①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368—369页。

② 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7年第27期。

③ 王勇:《〈汉唐地理书钞〉讹误考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1期。

④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山谦之〈丹阳记〉》,第318页。

按：王谟据《世说新语》注辑录刘宋山谦之《丹阳记》，语出《世说新语》卷下《轻诋第二十六》：“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刘孝标注：“《丹阳记》：‘丹阳冶城，去宫三里，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又云：‘孙权筑冶城为鼓铸之所。’”说明“冶城”所在。而“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石头城、冶城两地相近，故刘孝标注：“既立石头大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当是徙县治，空城而置冶尔。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汉高六年，令天下县邑，秣陵不应独无。”进一步指出《丹阳记》记载的“冶城”与《世说新语》中“石头城”“冶城”间的关系。“既立”以后语当为刘孝标注语，非《丹阳记》文，王谟将此辑入《丹阳记》属臆入后人语。

（二）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在系统辑录六朝地志佚文方面功不可没，但该书错漏较多，辑佚质量颇受质疑。卞东波指出：“（刘书）在收罗汉唐方志上用力颇勤，然而讹误之多亦足使读者瞠目。”失误类型有“一、校对校审不严；二、误辑（包括非方志而辑入、他书内容而误辑入、臆入后人之语）；三、重辑；四、漏辑；五、题解舛误；六、出处舛误；七、断句不清；八、未能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①陈尚君评刘氏辑本“编例大体上是简明而得当的，各书遗文的搜集，程功也颇多，其中半数以上为首次辑出，尤为不易”。而该书存在问题有三：“一、未能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已有的辑逸成绩；二、贪多务得，挂漏颇多；三、残本未充分调查、记录和利用。”^②华林甫归纳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13种失误类型：“1. 不明政区沿革而致误；2. 标点误；3. 句读误；4. 成书年代臆说；5. 同名异书混淆；6. 异名异书混淆；7. 地名异地同名而误；8. 成书年代可进一步考证而仅止于笼统为说；9. 作者有考而失考；10. 盲从前人而沿误；11. 辑录不完整；12 重出；13. 失收。”他还指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的错误是相当惊人的”^③。

此外校正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的专文不少，熊清元梳理刘书讹、脱、衍、倒及句读不当等问题共44处^④；何九盈订正刘书句读之误54处^⑤；李凤玲以刘书所辑《京口记》《南徐州记》为例，说明其中文字讹、脱、衍、倒及误辑、漏辑等问题。^⑥

上述成果对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失误已有充分考证，这里另举刘书所辑可榷条目4处：

1.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刘澄之〈扬州记〉》：

金陵南沿江有新林桥，即梁武帝败齐师之处。（景定《建康志》卷十六）^⑦

按：此条刘氏据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辑录刘宋刘澄之（生卒不详）《扬州记》，核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六年（1801）金陵孙忠愍祠刻本景定《建康志》征引此条时均未著撰者名。（1）刘澄之，彭城绥与里（今安徽萧县东北）人，《宋书·营浦侯遵考传》：“遵考，高祖族弟也。”“子澄之，顺帝升明末贵达。”知刘澄之为刘宋顺帝时人。而刘纬毅所辑佚文中有

① 卞东波：《〈汉唐方志辑佚〉纠误》，《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陈尚君：《评〈汉唐方志辑佚〉》，《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

③ 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7年第27期。

④ 参见熊清元：《〈汉唐方志辑佚〉举误》，《古籍研究》2000年第3期。

⑤ 参见何九盈：《〈汉唐方志辑佚〉标点商榷》，《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⑥ 参见李凤玲：《〈汉唐方志辑佚〉纠谬》，《古典文献研究》，2005年，第1—4页。

⑦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175页。

“梁武帝（502—549年在位）”谥号，则此《扬州记》当撰于梁武帝（549）后，与刘澄之时代不符。（2）此条佚文有“金陵”地名，战国楚威王七年（前333）灭越后置金陵邑（在今江苏南京市），六朝称“建康”。《晋书·王导传》：“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若此《扬州记》为刘宋刘澄之撰，不当称“金陵”，而应称“建康”。（3）景定《建康志》引《扬州记》共两处，其一为上述卷16引佚名《扬州记》，其二为卷18引“曹宪《扬州记》”。曹宪（生卒不详）^①，扬州江都（治今江苏扬州）人。《旧唐书·曹宪传》：“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知曹宪为唐太宗时人，其著述称“梁武帝”“金陵”亦属合理。

因此刘纬毅据景定《建康志》卷16所辑佚文非刘澄之《扬州记》，或出唐曹宪《扬州记》。

2.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沈怀远〈南越志〉》：

龙乡县属广熙郡，梁大同中分广熙置建州，又分建州之双头洞立双州，即其地也。（《寰宇记》卷一四六泷水县）

桂州丰水县有古终藤，俚人以为布。（《御览》卷八二〇布）^②

按：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所辑两条分别出《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检金陵书局本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古逸丛书”影宋本《太平寰宇记》卷146、四部丛刊影宋本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卷820征引《南越志》时均未著撰者名氏。（1）刘宋沈怀远（生卒不详），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宋书·沈怀文传》：“（沈怀文）弟怀远，为始兴王浚征北长流参军”，“坐纳王鹦鹉为妾，世祖徙之广州，使广州刺史宗慆于南杀之。”“前废帝世，流徙者并听归本，官至武康令。”^③知沈怀远生活时代当在宋世祖孝武皇帝刘骏（453—464年在位）至前废帝刘子业（464—466年在位）前后，《南越志》或作于广州刺史任上。（2）刘氏所辑佚文第一条有“梁大同（535—546）”年号；第二条有“桂州”地名，据《隋书·地理志》，桂州乃南朝梁天监六年（507）置，地处于苍梧、郁林之境。则此种《南越志》时代当在梁以后，与刘宋沈怀远时代不符。（3）《太平寰宇记》卷157“岭南道”引《续南越志》佚文3则，中有“唐天后朝（690—705）”，语涉唐中后期事，又为宋初总志征引，当为唐后期或五代著作，与沈怀远《南越志》同名异书。

据此，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据《太平寰宇记》卷146及《太平御览》卷820所辑两则《南越志》佚文非出沈怀远《志》，此疑为《续南越志》文。

3.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佚名〈武阳记〉》：

山际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包茅山。（《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三峰峙其南，一水界其北。（《纪胜》卷一三四邵武军风俗形胜）^④

① 参见卢桂平《扬州历代名人传》（广陵书社，2015）考证曹宪“约生于梁大同十一年（545），卒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105岁”。

②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74、285页。

③ 《宋书》卷82《沈怀文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10页。

④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359页。

按：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分别据《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及《舆地纪胜》辑录《武阳记》佚文2则，并撰提要：“撰人不详，未见著录。唐初《括地志》已引，当为唐前之作。”^①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引《武阳记》共两处，其一卷71“沅州”引《武阳记》：“上有三脊茅，可以缩酒。”其二为上述《舆地纪胜》卷134“邵武军”引《武阳记》：“三峰峙其南，一水界其北。”而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宋”条目据此著录：“《武阳记》，失撰人名氏。《舆地纪胜》增。”以《舆地纪胜》所引《武阳记》为宋代著作。

(1) 刘氏所辑佚文第一则转引自《史记正义》，原文为《史记·夏本纪》：“三国致贡其名，包匭菁茅。”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辰州卢溪县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阳记》云：山际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包茅山。’”^②中有“卢溪县”“包茅山”名，卢溪县为隋大业（605—618）末置，唐属江南道辰州，在今湖南省卢溪县西南；包茅山即苞茅山，在今湖南省麻阳县东九十里。(2) 刘氏所辑佚文第二则出《舆地纪胜》卷134，此卷引《武阳记》归于“邵武军”下。邵武军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在今福建邵武县。两则佚文所载地域范围差异较大。(3) 考《舆地纪胜》卷134“邵武军”引《武阳记》“三峰峙其南，一水界其北”一语，宋祝穆《方輿胜览》卷10“邵武军”：“郡名邵武、武阳……‘三峰峙其南’（《郡志》云云）。”这里“郡”则指“邵武、武阳”，“《郡志》”所指或有二，其一，指《邵武郡志》，据明弘治《八闽通志》卷39，为宋叶宋撰。其二，指《武阳志》，考《方輿胜览》卷十“邵武军”下其他称出“《郡志》”条目，《舆地纪胜》“邵武军”均称出“《武阳志》”。据《宋史·艺文志》，《武阳志》有宋葛元鹭（生卒不详）与宋何友谅（生卒不详）所撰两种。

据此，疑《舆地纪胜》卷134“邵武军”所引“三峰峙其南，一水界其北”出宋代方志，刘氏辑本以之入唐初《括地志》所引《武阳记》不妥。

4.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孙诜〈临海记〉》：

州东北七十里临海中有芙蓉山。智者禅师传云，出海口望芙蓉山，竦若红莲之始开。（《寰宇记》卷九八临海县、嘉定《赤城志》卷一九秀丽山）^③

按：孙诜（生卒不详）《临海记》，未见著录。《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并引之，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浙江省府县志类”：“《临海记》，宋孙诜纂。孙诜，字休群，太原人，见《南史·邱巨源传》。”^④则《临海记》为南朝刘宋著作。

核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据《寰宇记》卷98所辑佚文中“出海口望芙蓉山，竦若红莲之始开”诸字实出隋释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则“智者禅师传”即指《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据《续高僧传》卷17、《佛祖统纪》卷7，释灌顶为隋唐僧人，俗姓吴，南朝陈至德（583）间居建业瓦官寺，隋杨广被立太子时曾往长安祝贺。则《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年代晚于孙诜《临海记》甚明。此疑刘氏辑本失考，将隋代文字属入《临海记》。

①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359页。

② 《史记》卷《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61—62页。

③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02页。

④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381页。

四 六朝地志辑佚的成就与展望

六朝地志辑佚肇自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明清以后地志辑佚之风渐起，王谟、陈运溶、何允中、董斯张、严可均、洪颐煊、张澍、黄奭、杜文澜、劳格、曾钊、孙诒让、缪荃孙、王仁俊、曹元忠等学者都先后对六朝地志做过辑佚。虽属断墨残楮，但零圭断璧，弥足珍贵，“不可以碎片轻忽之”^①。晚近以来，越来越多学者投入六朝地志辑佚工作中，取得的进展主要包括如下几端：

一是地志概貌逐步恢复。六朝地志涵广事丰，但因其时代绵远，佚多存少，以之为基础的相关研究往往文献不足征。前修时贤的辑佚成果虽较零散，但也基本完成“找米”的工作，将各家辑佚成果汇总起来，则可一窥六朝地志概貌，一定程度改变了地志研究“无米可炊”的局面。

二是辑佚来源大体划定。六朝地志辑佚所资甚广，既有的辑佚成果已大体划定了地志辑佚的资源范围，包括“唐宋类书”“子史及汉人笺注”“诸史及总集”“地理杂记”“地理书”“后世方志”等，为六朝地志辑佚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法指导。

三是辑佚范式初步确立。各家辑佚体例虽在“撰叙言”“排次序”“注出处”“标异文”“详校勘”“勤考证”等方面各有优长，但总体呈现后出转精之势，并不断探索完善，为六朝地志佚文的全面整理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但同时，六朝地志辑佚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也是今后辑佚工作应注意的方面：

其一，重复性辑佚较多。不少地志已有多种辑本，如魏晋佚名《巴汉志》有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辑本，后陈晓捷《关中佚志辑注》^②与王文才《蜀志类钞》^③亦辑录《巴汉志》，却并未完全吸收前代辑佚成果。除方志流传程度存在差异外，更主要是缺乏对已有成果的梳理，导致出现重复性整理。

其二，缺乏深入的佚文考辨。六朝地志文本多赖历代总志、类书、笔记等典籍征引得以留存，后人引书难免有张冠李戴之处，佚文的整理若能结合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版本学、年代学的相关考察，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才能做到言有所依、论有所据。

其三，海外资源利用不足。六朝地志的补辑工作离不开新材料的发掘，目前的辑佚资源多以国内文献为限。而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东方博物馆，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方志达 2590 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更是达 4000 余种。这类海外各国图书馆珍藏的大量旧志，都是“以方志辑方志”的重要资源，不可忽视。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481 页。

② 参见陈晓捷：《关中佚志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146—148 页。

③ 参见王文才：《蜀志类钞》，巴蜀书社，2010 年，第 124—125 页。